

陈星 朱晓江 著

从「湖畔」到「海上」

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陈星 朱晓江 著

从「湖畔」到「海上」

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
陈星,朱晓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2

ISBN 978 - 7 - 5426 - 3156 - 5

I. ①从… II. ①陈… ②朱… III. ①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1287 号

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

著 者 / 陈 星 朱晓江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范娇青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10 千字

印 张 / 15.75

ISBN 978 - 7 - 5426 - 3156 - 5/I · 449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导 论 概念界定与本书研究的重点及方法	1
第一节 “白马湖作家群”概念考辨	3
第二节 作为文学“零地标”的白马湖及其象征意义	6
第三节 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发展与分期	12
第四节 白马湖作家群的核心人物	13
第五节 白马湖作家群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及语丝社等文学社团之关系	14
第六节 本书的研究重点与方法	17

上 编

形的追踪——作为一个文学群体的轨迹勾勒

第一章 西子湖畔

——白马湖作家群的孕育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期	21
第一节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白马湖作家群人脉	21
第二节 “一师风潮”与“一师三友”的出走	29

第二章 从西子湖畔到白马湖

——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期：春晖中学时期	35
第一节 白马湖概说	35
第二节 群贤毕至，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	36
第三节 文质并美，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品与人品	45
第四节 告别白马湖	52

第三章 从“湖畔”到“江湾”

—— 白马湖作家群的繁荣期：立达学园与开明书店时期.....	57
第一节 创办立达学园、开明书店的缘起和过程.....	57
第二节 立达学园、开明书店的创立标志着白马湖作家群成熟期的到来.....	61

第四章 “孤岛”与“星散”

—— 白马湖作家群的消退期：抗战以后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活动.....	71
第一节 立达学园的衰落与匡互生逝世.....	71
第二节 抗战爆发与部分群体成员的离散.....	74
第三节 “艺术的逃难”与执著的追求.....	78

下 编

神的写照——作为一个文学群体的精神描述

第五章 白马湖作家群文化个性描述

—— 作为一个作家群体的精神内核.....	87
第一节 建设性的文化态度.....	87
第二节 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内核.....	97
第三节 中西融合的文化风度.....	103

第六章 白马湖作家群的教育实践与文学创作

—— 兼及文学史视野下的“国语”教学.....	109
第一节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109
第二节 “国语科”的“合法化”与新文学的传播与巩固.....	114
第三节 “怎样教”背后的文学史意味.....	119
第四节 为教学的写作.....	130

第七章 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与出版活动..... 138

第一节 中国早期出版活动中的两种理念.....	138
第二节 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及其出版实践.....	140
第三节 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与其文学活动.....	149

第八章 题材与风格：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写作..... 154

第一节 白马湖作家群散文写作的题材选择.....	154
--------------------------	-----

第二节 白马湖作家的散文特色	198
第九章 白马湖作家群：作为一个文学群体的文化意义	214
第一节 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典范	214
第二节 汇融中西方文化的态度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220
第三节 “艺术生活”：现代性反思及解决问题的方案	224
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46

导论 概念界定与本书研究的重点及方法

1946 年,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叶圣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这所谓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在主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在党派方面的同志。只是说我们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是这么样的同志。这些同志都能够读些书,写些文字,又懂得些校对印刷等技术方面的事,于是相约开起书店来,于是开明书店成立了。^①

开明书店的成立当然远非这么简单,它还牵涉到历史文化背景、资本运作等许多具体问题;但叶氏对围绕在开明书店周围的这个“同志的结合体”的描述,却极其到位。这个“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却又“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的文人群体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白马湖作家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一个散文创作群体,与其相关的重要的外围人物又包括经亨颐、李叔同(弘一大师)、俞平伯、匡互生、刘薰宇、刘叔琴等;而其文化活动除了文学,也还涉及到教育、出版、艺术等诸多领域。在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史上,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及其文化活动,始终都是一股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对这个文学群体中的作家作个案研究,学术界向来是重视的,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上述作家,尤其是其核心作家,不仅是 1920—40 年代中国文学界成就卓著的人物,而且也还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同步的一批重要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其在中学语文界为“国文课”获取合法地位所做的争取,包括这之后所开展的具体的教学实践,既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

^① 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周年》,《叶圣陶集》第 6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年 1 月第 1 版,第 224 页。

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新文学合法性地位的取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①而在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亦开始把这批趣味相投、文学理念相近的作家视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1981年，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的《前言》中，特别提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白马湖风格”，并以夏丏尊与朱自清为白马湖散文派的领袖。^②此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以“白马湖作家群”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或散文选本的不断出版，学术界对“白马湖作家群”的关注亦进一步升级。^③

然而，虽然如此，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群体的研究在总体上仍然是不足的。尽管这个群体中有许多作品被选入中学课本和各种现代文学作品选集，并被当作范文来加以选讲，但相应的学术成果仍显不足。从现有的学术成果来看，已有的研究大多也还停留在零星的状态，即比较注重单个作家与这个群体的某一时段的研究，而在整体上对这个群体做出研究，比如对这个群体的成因、演变做史的分析，并以这样的研究成果反观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就很寥寥。^④这是很让人遗憾的。

有鉴于此，本书的研究将从史的维度对这一文学群体的演变、发展做出整体上的研究。通过我们的研究，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学术缺憾，即能从整体上勾勒出其大致的发展脉络。同时，在史的维度以外，我们还将从这个文学群体的内在精神意蕴方面描述其内在的凝聚力，用这种凝聚力来贯穿它在史上的各个演变阶段，从而解释这些不同的阶段所以能在“白马湖作家群”名下加以分析的原因，并借此阐明该群体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文学流派的内在本质特征。

^① 就个案研究而言，对白马湖作家群的研究几乎是与他们的创作同期进行的。在白马湖作家的个人文集中，我们即可以读到他们之间在写作上互相批评的文字，如朱自清的《〈燕知草〉序》（1928年）、《叶圣陶的短篇小说》（1930年）、《〈谈美〉序》（1932年），夏丏尊的《论记叙文中作者的地位并评现今小说界的文字》（收1926年出版的《文章作法》）等，此外，叶圣陶《文章例话》（1936年）中的《朱自清的〈背影〉》、《夏丏尊〈整理好了的箱子〉》、丰子恺《现代建筑的形式美》诸篇，虽是为中学生写的赏析性文字，但其中亦牵涉到这些作品的写作与用语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白马湖作家群研究方面的早期成果。另外，关于白马湖作家群的“国文”教学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本书第六章将有比较详细的展开，可参阅。

^② 参见杨牧《中国近代散文选》之《前言》，台北：洪范书店，1981年8月初版，第6页。

^③ 在这些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专著有陈星于1996年出版的《教改先锋——白马湖作家群》（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8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简体字版，书名为《白马湖作家群》）和张堂锜于1999年出版的《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两部；此外，朱惠民于2006年8月出版了他历年来关于“白马湖派”研究的论文合集《白马湖文派散论》（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王建华、王晓初于2007年1月出版了他们主编的论文集《白马湖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至于出版的散文选本，值得关注的有1993年10月由浙江省上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夏弘宁主编的《白马湖文集》，1994年5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朱惠民选编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等。

^④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1980年代迄今，在这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以这个文学群体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其实仍只有陈星与张堂锜于1990年代出版的两部著作。这与这个文学群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第一节 “白马湖作家群”概念考辨

在白马湖作家群的研究工作中,首先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这个文学群体的命名,意见仍然很不一致。因此在本书研究的起点,我们仍有必要就概念的命名与内涵作一番考辨。

一方面,有些学者将它看作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流派,因而命其名为“白马湖派”,并试图从“流派”的宏观层面出发,勾勒出带有共性的“白马湖派”的创作风格或美学特征。在目前的白马湖作家群研究中,这样的研究思路与学术成果并不鲜见;^①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无论“白马湖派”还是“白马湖作家群”的命名,都不能成立,因为这其中的核心作家——比如叶圣陶——与白马湖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②因此,白马湖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地域名称,不足以概括这一个文学群体的全部文学、文化实践。由此,他们提出了别一种称谓,比如“立达派”“开明派”等等。^③

我们的意见恰在这两者之间。一方面,我们认为,将白马湖作家群当作一个文学流派来加以研究,确有其不成熟的地方。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所谓“文学流派”,是“有着比较接近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采用大致相同的创作方法,在一个共同的旗号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群”^④。这就是说,对文学流派的界定可以从两个层面出发加以考察:一是从“比较接近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采用大致相同的创作方法”的层面,即从文学创作风格的层面出发加以考察,强调的是其创作风格上的大体统一;二是从“在一个共同的旗号下从事文学创作”的层面,

^① 比如朱惠民在《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的编选后记《红树青山白马湖》一文中认为:“‘白马湖派’散文的艺术特色,即清隽平淡,这并非平铺直叙,亦非玄言诗那样‘淡乎寡味’,这种平淡是铅华落尽后的天然风姿,是返璞归真……凡属于同一流派的作家必然在个人风格的基础上,表现出共同的东西,必然在众多的独特风貌中显示出大体一致的美学倾向,一种共同的美学追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254页)虽也强调个体风格,但却认为个体风格表现出了流派的共同的美学特色。这样的研究思路与言说方式此后遂成为白马湖作家群散文研究的“标准版本”。张堂锜在他的《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一书中亦将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风格概括为“朴实、清醇、隽永”。用语虽然不一,但其内涵指向却与朱氏基本一致。

^② 比如姜建在《“白马湖”流派辨正》一文中即从“集聚方式”、“体裁”、“文学阵地”、“时间跨度”、“清淡风格”五个方面提出质疑,认为“去掉那些似是而非、未经认定的东西,这个看似阵容相当可观的白马湖散文流派是否还能够存在,已经无需多言了。”(载《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66—70页)

^③ 一个富有意味的细节是,在由钱理群等合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颇具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其初版(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将这个文学群体称为“立达派”,而在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版中,又将这个文学群体称为“开明派”。同一本著作,不同的称谓,可见学术界对这个文学群体在命名上的意见分歧。

^④ 江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青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页。

即形成文学流派的社团依托的层面出发加以考察,强调的是流派风格形成的制度、组织保障。

从文学社团的角度看,^①显然,白马湖作家群并没有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那样正式立社结派,拥有自己的“旗号”、运作机构、章程以及机关刊物等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白马湖派”还是“白马湖作家群”,或者“立达派”“开明派”等等,其名号都是研究者后来加上去的,而不是当事人自封的。^② 这就是说,对白马湖作家群的核心及外围作家来说,他们本身无意组织这样一个文学社团,并在这个文学社团的整体规划下,在 20 世纪中国的文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这样,在这个文学群体发展的各个阶段,他们一直都没有发表集体的纲领性宣言或章程,也没有自己固定的办事机构与明确的机关刊物。从这样一些层面出发加以考察,我们认为,所谓的白马湖作家群,其实只是一个松散的文学群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也正因为此,白马湖作家群在创作上并没有统一的风格要求。

而事实上,以白马湖作家群创作上的“统一的风格”来作为其“流派”成立的依据也不是很充分,盖白马湖作家群的各个作家之间,在创作上固然有相对共同

^① 当然,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陈思和在为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所写的《总序》中认为,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第一辑 7 种,东方出版中心,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4 页)然而虽然如此,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流派与社团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杨义在《“五四”小说流派的文化取向之比较》一文中认为:“我国现代小说真正出现流派是从 1921 年开始的。1921 年元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于北京;6 月,创造社成立于日本……以社团和文学刊物作为纽带,不同作家群体之间聚散离合……推动了文学个性和文学风格向多元化发展。”(收《杨义文存》第 4 卷《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78 页)

^② 在这一点上,郁达夫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郁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认为:“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添加上去的,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那么的。”文学社团的会员当然并不像当职员,但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文学社团都在成立的当时就已经确定了社团的名号与章程(或者宗旨),然后再根据章程吸纳会员,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特征。比如文学研究会在发起的时候,即有宣言、章程、代用会刊与组织机构,并有其明确的会员名单。郁达夫所在的创造社,虽然自己标榜“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1922 年第 1 卷第 2 期),但创造社的“社团”意识其实一点也不比文学研究会差。这既可以从他们的批评文字中读出,也可从创造社的筹备成立中见出。1921 年 6 月 8 日,在创造社成立的 6 人会议上,与会成员“决定组织文学团体,名叫创造社,出季刊及丛书”(张资平《曙新时期创造社》,《现代》1933 年第 3 卷第 2 期),而“《创造》的名目及季刊的形式”早在会议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因此创造社的成立也是由当事人自己命名,并有其基本的组织运作机构的。更有意味的是,1926 年 9 月,在广州召开的创造社大会上通过了《创造社社章》和《创造社出版部章程》,前者试图从制度上规范成员的加入与离开。到这时候,创造社在形式上也已具备了严格的“社团”特征。但白马湖作家群却既没有自己的名号,也没有自己的机关组织与核心刊物,更没有吸纳需交纳会费的会员,因此并不能以严格的文学社团视之,而只宜看作是一个松散的文学群体。

的一面,但这个共性若从作家全集的角度出发加以考察,那么所占的比重也不是很大。比如,叶圣陶的散文中含有大量的时论,态度激越,而丰子恺的散文却更多地带有文化上的反思力;朱自清的“美文”具有华丽精工的美学意蕴,而夏丏尊却以沉郁朴实见长。因此,普通用以概括白马湖作家群散文特征的诸如“冲淡朴实、清丽自然”一类的词语,其实只是一句浑话,盖“清丽”“朴实”各有所指,并不能概括这群作家在创作上共同的美学追求与风格特征。^①

然而,这样一些在创作风格上都颇具个性的作家仍然可以在“白马湖作家群”的名下,以一个相对整体的文学群体来加以考察,个中原因殆在于其文化上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更明确地说,我们之所以选择将这批作家当作一个文学群体来加以分析,原因是基于其相对统一的文化个性——一种立基于“立人”思想的建设性的文化个性。这样的文化个性使这批作家无论在创作的领域,还是在教育、出版的领域,都呈示出了相对一致的价值取向;而白马湖作家之间深厚的个人友谊与交游,也为他们能成为一个比较松散的文学群体提供了条件。这也正如叶圣陶所言,他们这个“同志的共同体”,一方面当然不是什么“主义”“党派”的结合,但另一方面却“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同时也还“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诚然,也有意见称:“文学与教育对白马湖派来说,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任缺其一,这个群体的精神与价值都将破碎而不完整。从这个意义上说,称‘白马湖派’是一个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不如说它是一个带有教育理想和社会使命的文化派别或文化族群。”^②白马湖同人的文化诉求和建树固然完全能够承载他们作为“文化派别或文化族群”的赞誉,他们在文学、艺术、教育(包括美育)、出版、联谊等多个方面的张扬和成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故此,如日后作一项新的研究课题——白马湖文化研究——是完全有必要的。然而,承认“白马湖文化群体”与研究“白马湖作家群”并不矛盾。所谓“文学与教育对白马湖派来说,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正说明“文学”是其研究的对象之一。更何况,白马湖同人基本上都是可被称作“作家”的文化人,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的笔迹,其文学成就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将这一群作家命名为“白马湖作家群”,而不是流派意味很浓的“白马湖派”。同样地,我们也不赞成将这一群作家命名为“立达派”或“开明派”,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立达派”或“开明派”的命名仍然具有文学流派的性质;另一方面,无论是“立达”还是“开明”时期,都只是这个文学群体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而“白马湖”虽然也只是该作家群发展历

^① 关于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分析,本书第九章有专门的讨论,此处不作展开。

^② 王利民《平屋主人——夏丏尊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41页。王利民在其后续的论述中也承认“白马湖派主要是个散文流派”。

程中的一个阶段,但却是她的“形成”期。就是说,从这个文学群体发展的整体来看,“立达”与“开明”都只是延续了“白马湖”时期即已形成的人文倾向;而“白马湖”在这个文学群体中,也具有特别的文学——文化意蕴,并作为一个主题在他们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呈现。从这一点来讲,“白马湖”之于“白马湖作家群”,仿佛就是一个城市的“零地标”,它既是这个城市(文学群体)的地理起点,同时也是这个城市(文学群体)的精神象征之所在。

第二节 作为文学“零地标”的 白马湖及其象征意义

在现代城市的地理规划上,“零地标”(Ground Zero)是指一个城市的“零公里”处。以“零地标”为中心,城市向四周延展。因此一个城市的“零地标”既是一个客观的地理存在,一个城市的中心之点,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是这个城市的历史与发展的精神象征。作为白马湖作家群的“零地标”,白马湖也具有类似的文化功能。

首先,对于“白马湖作家群”来说,白马湖畔的聚首是他们第一次以一个相对完整的阵容出现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在这里,丰子恺、朱光潜开始走上文坛,从而与之前已经活跃在文坛的夏丏尊、朱自清会师,构筑起这个文学群体的主干力量;另一个主力成员叶圣陶及其外围人物俞平伯,则与生活、工作在白马湖的朱自清、丰子恺、夏丏尊等保持着紧密的文学联系。^① 至于经亨颐、李叔同(弘一大师)、匡互生、刘薰宇、刘叔琴等相关人物,也先后到春晖中学任教或驻足。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 1922—1924 年间,白马湖是这个作家群体的文学——文化活动中心。

其次,正是在白马湖畔,白马湖作家群以“立人”为核心的建设性的文化个性得以奠定;而其教育、出版、文学三位一体的文化风貌也在那里基本成形。在白

^① 俞平伯曾于 1924 年到春晖访问;1924 年 4 月,身在春晖的朱自清、丰子恺会同上海的叶圣陶、刘大白,北京的顾颉刚,以及闲居杭州的俞平伯等人组织成立了一个松散的文人团体“O. M.”(意即“我们”),并于同年 7 月出版《我们的七月》。由此可见白马湖与上海、北京、杭州之间的文学联系与互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马湖并不像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那么偏僻。另外,据春晖中学编辑、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7 月出版的《浙江省春晖中学》(中国名校丛书之一)记载,叶圣陶曾于 1923 年秋到春晖中学访问,“住平屋,是首次来白马湖”(参见该书收录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到春晖中学考察和讲学名人一览》,第 109 页)。疑误,因除此以外我们找不到 1923 年叶圣陶到春晖的相关记录。然而叶圣陶还是到过春晖、领略过白马湖秀丽的风姿的。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6 月出版的《叶圣陶集》第 3 卷收录叶氏照片 4 帧,其中第 1 帧即为 1928 年 1 月拍摄的以白马湖畔夏丏尊先生“平屋”为背景的 7 人合影,编者题其名为《访夏丏尊先生》。因此,有学者认为叶圣陶没有到过白马湖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马湖畔，白马湖作家群的主干力量既是春晖中学的教学核心，同时也是《春晖》半月刊的主要编辑者、撰稿人。他们既写新文学作品，同时又教现代白话文、宣扬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系列的文学——文化活动，凝聚起了这个作家群的“神”的所在，^①从而也为这批作家可以在“白马湖作家群”的名下加以讨论，提供了内在的精神支持。

第三，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白马湖”的现代人文内涵是由以白马湖作家群为核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奠定的。这使“白马湖”的地域概念与白马湖作家群这一文学群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两者之间有了若干共通的思想素质。换言之，人们在提起“白马湖”的时候会想起“白马湖作家”，而在讨论“白马湖作家”的时候也会想起风光秀丽的“白马湖”。这种共通的思想素质也为“白马湖作家群”的命名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在现代文学史上，白马湖作家对白马湖有过许多经典的描写。这些描写颠覆了白马湖传统地方志意义上的精神象征，而别赋其以“现代”（现代文学）的经典形象。

白马湖，现位于浙江省上虞市东北部，距市政府所在地百官镇 5.5 公里。在上虞，这个外形酷似飞马的湖泊历来都有些名气。^②《水经注》对此湖即有如下记载：

白马潭，潭之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或谓故县令周鹏举出守雁门，志务幽闲，思上虞景物之胜，乘白马泛铁舟，全家溺于此，时人以为地仙。^③

在这里，湖的命名与传播是与乡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湖水的泛滥常常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所以人们“以白马祭之（湖）”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全收成，而湖水在祭祀之后大约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泛滥肆虐，所以乡民们才进一步“以（白马）名水”。这样的命名仪式既有民间的宗教意味——以白马“镇湖”，从而确保收成，同时也带有村民们的感恩心理；此外，为纪念县令遇难而以其乘坐之“白马”名湖，也含有纪念该县令政绩的意味。因此，从地方志的角度看，白马湖的地名一直都带有一些乡土的神话色彩，以及与日常民生紧密联系在

^① 叶圣陶所谓的“意趣上的互相理解”，主要也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而言的。

^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为的因素，目前的白马湖湖面已有很多被侵占或改造，“白马”之形已较难辨认。

此外，在中国名曰白马湖的湖泊有多处，如在湖南涟源市白马镇、贵州安顺市等地都有白马湖，而在江苏省四邻淮安、金湖、洪泽、宝应四县（市）之地的白马湖，传说其得名也与“白马”有关。参见陈凯军《戏说白马湖》一文，载《中国地名》2000 年第 3 期（总第 93 期）。

^③ 引自《上虞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58 页。

一起的文化内涵。

然而在 20 世纪，这个地处偏远的乡村湖泊之所以能够获得全国性的声誉，原因却并不在于乡土神话，而基于湖畔新建的一所中学——春晖中学，以及因了这所中学而汇聚在一起的一个文人群体。正是这些文人的到来，改写了白马湖的传统形象，从而使其以“现代”的形象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朱自清在《春晖的一月》中这样描写他的白马湖“初面”：

这是一个阴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①

在朱自清的笔下，白马湖已完全涤荡了民间的宗教意味，而以一个全新的、青春的文学形象——朱自清式的“少女”形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这个形象既是 20 世纪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重要形象之一，同时也与湖畔新建的学校的形象、与围绕在学校周围的新文化运动的气息相一致。在《春晖的一月》中，紧接着上面这段引文，朱自清讲到了湖畔的中学：

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②

联系前后文，我们可以发觉，对白马湖的礼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基于湖畔的中学，以及在中学里教书的那一批可爱的同事。就是说，假如没有春晖以及那些称得上是“同志”的同事，白马湖的形象一定还要打些折扣。而前者，正是与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经过朱自清（当然也包括其他白马湖作家）

^① 朱自清《春晖的一月》，收《朱自清全集》第 4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21—122 页。

^② 同上，第 122 页。

的改写,传统乡土意义上的“白马湖”已经具备了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文化运动的思想品格。这一点,我们在与夏丏尊笔下的白马湖形象作对比后,当可有更进一步的体会: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是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深夜。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①

和朱自清相比,作为上虞本土人士的夏丏尊笔下的“白马湖”,其实也并不那么可人;而这,其实倒正是“白马湖”的本来面貌——住过春晖的人,多少都会对白马湖的“风”有些感觉。然而问题在于,自从朱自清描写白马湖的文章问世以后,白马湖就是以朱氏形象流传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不特如此,就是夏丏尊笔下的白马湖,人们关注更多的,似乎也是作者最后提到的那种“诗趣”;而杨牧更是从文章学的角度,认为夏丏尊的这篇文章树立了白话记述文的模范。^②所有这些都说明,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作为地理名词的“白马湖”,已经与上述经典的现代散文以及写这些散文的现代作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其具有了新的人文意蕴。正是这种新的人文意蕴使它有了可以指称这个散文群体的文学、思想基础。

第四,同样也还是在白马湖畔,这群作家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这种诗化的人际交往连同对“白马湖”的反复抒写,遂使白马湖成为这群作家笔下的经典意象,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人文象征意味。这种象征同样具有内凝力,它不但使此后远离白马湖的这批作家能够重温白马湖时期的生活与友谊,而且还在一个想象的空间中,构筑起其作为一个文学群体的精神场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白马湖在这批作家中的精神象征意味。

这些文章大都出自这批作家自己的手笔。由于是事后追忆,兼具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因此别具审美意蕴。1929 年,在离开白马湖 3 年以后,朱自清仍然写了一篇题为《白马湖》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湖光山色与朋友情谊兼具,

^① 夏丏尊《白马湖之冬》,收《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61 页。

^② 参见杨牧《文学的源流》,台北:洪范书店,1984 年 1 月第 1 版,第 56 页。

对白马湖的抒写，同时也就是对朋友友情的追忆：

春晖中学在湖的最胜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丐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丐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①

这种“在暗里摸索着回去”的情形，在俞平伯的日记里有更为诗意的记载。俞平伯曾在日记里记载了初到春晖、和朱自清一起在夏丐尊家喝酒而归的情景：

饭后偕佩弦烛而归。长风引波，微辉继之。躋躅郊野间，纸伞上沙沙作繁响，趣味殊佳，惟苦冷与湿耳。归寓畅谈至夜半始睡。^②

朱自清的文章尽是新文学的笔法，而俞平伯的日记则带有传统笔记体文字的韵味。然而无论是新文学还是旧笔记，两者共同构筑起了一种与白马湖有关的情愫，一种特殊的人文气氛。这种气氛在朱光潜的笔下也有极其精致的描述：

同事夏丐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我们吃酒如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③

同样的意思，朱光潜在《缅怀丰子恺老友》一文中还有记述：

^① 朱自清《白马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285页。

^② 俞平伯《忆白马湖宁波旧游——朱佩弦兄遗念》，收夏弘宁主编《白马湖文集》，浙江省上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10月，第241—247页。

^③ 朱光潜《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收《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53—155页。

……那里同事的有夏丏尊、朱自清和丰子恺等人，我们课余闲暇时经常在一起吃酒聊天，我至今还记得子恺酒后面红耳赤，欣然微笑，一团和气的风度，这时他总爱拈一张纸乘兴作几笔漫画，画成就自己制成木刻，让我们传观，我们看到都各自欣赏，很少发议论，加评语。^①

不同的文章，同样的描述，可见对此场景的记忆之深；而朱自清在为丰子恺漫画集所作的序言中，也透露出类似的人文意蕴：

你总该记得，有一个黄昏，白马湖上的黄昏，在你那间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的一颗骰子似的客厅里，你和我读着竹久梦二的漫画集。你告诉我那篇序做得有趣，并将其大意译给我听。我对于画，你最明白，彻头彻尾是一条门外汉。但对于漫画，却常常要像煞有介事地点头或摇头；而点头的时候总比摇头的时候多——虽没有统计，我肚里有数。那一天我自然也乱点了一回头。^②

“白马湖”、“喝酒”、“不慌不闹”、“读书”，仿佛电影蒙太奇一样，这四个意象并置在一起，完全勾勒出了白马湖作家之间的友谊与气氛；而当事后他们在记忆的层面复制这样的生活场景时，在一个想象的空间里，一个只属于白马湖作家自身的特殊的精神场域形成了。由此，对于白马湖作家群来说，“白马湖”这三个字，正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内凝力。

第五，除此以外，白马湖作为一个乡村湖泊，还具有作为现代都市文明对照物的文化功能。就是说，在许多场合，白马湖畔的生活为白马湖作家能以乡村的立场反观现代都市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视角，从而开拓了白马湖作家群散文的文化品质。在这一点上讲，“白马湖”既是一个地点，一个文明参照的视点，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原点，在白马湖作家群中拥有核心的地位与价值。在《山水间的生活》一文中，丰子恺即以“骚扰的寂寞”和“清静的热闹”两种形态来分别概括上海（现代都市）与白马湖畔（传统乡村）的生活，^③颇具象征意义。

^① 朱光潜《缅怀丰子恺老友》，收《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475—477页。

^② 朱自清《〈子恺漫画〉代序》，收《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221页。

^③ 其原文是：“我曾经住过上海，觉得上海住家，邻人都是不相往来，而且敌视的。我也曾经做过上海的学校教师，觉得上海的繁华和文明，能使聪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觉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受到很恶的影响。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见丰子恺《山水间的生活》，收《丰子恺文集》第5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12—15页。